

我们终于读懂了不一样的杜甫

王小柔

大历五年(770年)秋冬,湖南湘江水面烟霞茫茫,一艘木船静静泊于江心。船上那位被后世尊为“诗圣”的老人,搁下手中笔,就此与人间作别。

一千二百余年来,我们对这一幕的想象从未改变:那是一叶飘摇破舟,老人瘦骨嶙峋、衣衫褴褛,在贫病交加、孤苦无依中走完悲剧一生。课本里的画像清瘦憔悴,文学史的叙述满纸苍凉,我们熟读他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却习惯性地将这些诗句抽离具体时空,钉下一枚永恒标签:杜甫,一生穷困潦倒、苦不堪言。

直到刘鲁颂《杜甫的船: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问世。这部以“船”为核心切口的著作,为我们揭开被遮蔽千年的真相:杜甫的船,不是破败扁舟,而是可载全家的私人船;他的晚年漂泊,不是被动逃难,而是清醒抉择后的精神远征;我们心中那个苦大仇深、瘦弱不堪的诗圣,从来不是完整的他。

这本书不仅是一部诗人晚年传记,更是一次文化祛魅,让我们在航行江波的故事里,遇见有烟火、有尊严、有选择、有温度的真实杜甫。

◆“又穷又瘦”是千年误会

我们对杜甫的认知,几乎始于课堂。老师指着课本插图说:这是杜甫,一生不得志,茅屋为秋风所破,晚年漂泊江上,死在一条小船上。于是,“瘦、穷、苦、惨”成为刻在骨子里的印象,千百年流传,成为不可动摇的“常识”。可这真的是全部真相吗?

杜诗沉郁顿挫,以写乱世悲情、民生疾苦见长,“布衾多年冷似铁,娇儿恶卧踏里裂”“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“老病有孤舟”“戎马关山北”等句,字字泣血,极易让人将诗人某一阶段的境遇,等同于一生的常态。可是作者说“诗歌是情感的极致表达,而非生活流水账,一时的饥寒,一段的流离,被艺术强化后,掩盖了他人生中安稳、从容、体面的阶段”。

后世推崇杜甫,核心是其“忧国忧民、忠君守道”的儒者品格。为了让这种品格更具感召力,文人与教化者刻意放大他的苦难,弱化他的生活细节,形成“越苦越高尚”的单一逻辑。久而久之,杜甫脱离了真实生活,变成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“苦德楷模”。

从课本插图到后世画像、雕塑,杜甫永远是清瘦苍老、衣衫褴褛、愁眉紧锁的模样。这种视觉先入为主,让我们根本无法想象,他曾是生活稳定、交游广阔、具备士大夫生活品位的知识分子。

在所有误会中,最深入人心、也最偏离真相的,便是对他最后五年江上生活的误解。无数通俗读物、文学史写道:杜甫晚年无家可归,只能蜷缩在一叶破旧小渔船上,随波逐流,最终贫病而终。这条“破船”,成为他悲剧人生的终极象征。

《杜甫的船: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便是从这条被误读千余年的船入手,以生活常识、杜诗

细节、唐代造船与航运史为依据,一步步透过迷雾,让我们看见:杜甫的船,是他亲手定制、造价不菲、可承载全家十余口人长期生活的私家大船;他的漂泊,是有准备、有保障、有尊严的迁徙,而非赤贫流浪。

这不是颠覆,而是还原。还原一个被符号化千余年的诗人,还原一段被遮蔽的真实人生。

◆ 船的真相 不是小扁舟

“老病有孤舟”是杜甫晚年名句,也是千余年误读的源头。在《杜甫的船: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中,作者用大量笔墨,以故事化的方式还原这艘船的真实面貌,让读者仿佛穿越千余年,亲眼看见这艘船的模样。

杜甫出川时,家中有妻子杨氏,儿子宗文、宗武,女儿,孙辈,再加上两三个奴仆、三四个船工,总计近二十人。“试想,一家老少十余口人怎么可能长期生活在一艘破旧的小船上呢?况且这是一艘能够在长江日夜航行的船,一艘须要经受暴风骤雨和激流险滩考验的船。”

作者结合杜诗文本,提取出关于船的关键细节,每一处都印证着“大船”的事实。据保守估算,这艘船长20米以上、宽6米以上,采用巴蜀优质楠木打造,船身绘有纹饰,散发着楠木与桐油的清香。船舱内设书架、几案、屏风、风灯,藏满书卷;底层储备粮食、药物、酒,衣食无忧;舱顶四角饰有飞檐,檐下悬挂风灯,兼具实用性与雅致感。

书中这样描述这艘船:“这是一艘耀眼的、带有巴蜀风格的、俗称‘并舟’的宽大帆船……船舱内整齐地摆放着书架,角落处码放着箱篋。木地板十分光洁,入口处摆着几案、凭几,这是杜甫的工作区;深处则铺有枕席,是家人平坐的生活区。十多人在这里或席地而坐,或伸足平坐,或侧身斜坐,或盘足趺坐,或高枕而卧,空间绰绰有余。”

这哪里是漂泊的扁舟?这分明是一艘私家大船,是杜甫在乱世中为家人撑起的安稳天地。

书中考据:“大历年间,一艘载重1000斛的漕船实际造价在500缗上下,巴蜀地区打造大船的费用,受通货膨胀影响,杜甫所造之船造价接近1000缗。”1000缗即一百万文钱,相当于唐代中级官员数年俸禄,绝非普通百姓所能承担。

杜甫能定制并长期养护这艘船,足以证明他晚年经济状况绝非“一贫如洗”。他在蜀地为官有稳定俸禄,得严武、章彝等地方官员慷慨资助,另有农田耕作、药材买卖等副业收入,生活处于小康以上水平。

◆ 出川真相与逃亡无关

关于杜甫离开成都浣花草堂的原因,传统观点一直认为:好友严武去世,杜甫失去唯一依靠,被迫流浪。书中以清晰的时间线与诗作互证,纠正了这一流传千余年的错误:杜甫离开成都,早于严武去世;他的离去,是主动辞职、理性选择,而非走投无路的逃亡。

严武是杜甫一生的知己与庇护人,他镇蜀期间,对杜甫厚待有加,表奏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,赐绯鱼袋,待遇优厚,“杜工部”的称号便由此而来。书中写道:“这个待遇不比杜甫此前在朝廷任职时差,严武将他当作特殊人才引进,对其照顾备至。”但幕府之内,并非净土。严武身边小人云集,嫉妒杜甫的才华与升迁,不断造谣中伤、搬弄是非,官场钩心斗角让杜甫深感厌恶,这才是他决心离开的重要原因。

杜甫一生怀抱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理想,即便身处蜀地安逸之中,也从未忘记初心。他在《忆昔二首》中念叨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”,怀念盛唐太平;在蜀地期间,他心系边防,呈上《东西川两说》,为抵御边患出谋划策;百姓的流离失所,时时刺痛他的心。

蜀地的安稳,反而让他不安。他不愿在安逸中消磨壮志,更不愿在官场泥潭中违背本心。出川,是为了回到中原,离家国更近,即便不能再居庙堂之高,也要用笔记时代表真相,用诗守望苍生。

永泰元年(765年)四月,杜甫的船从浣花草堂前的水槛启航。他在《去蜀》中写道:“世事已黄发,残生随白鸥。”看似悲凉,实则是清醒的抉择——不是被命运推着走,而是主动掌控人生航向。

◆ 还原杜甫人间真相

撕下“穷、瘦、苦、惨”的刻板标签,该书最打动人的,是写出了杜甫作为普通人的烟火气与温度。我们总以为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,却忘了他也是温文的丈夫、尽责的父亲、热爱生活的士大夫。

书中还原了杜甫的生活日常,他懂营造、爱生活。在成都,他亲自规划营建浣花草堂,“去郭轩楹敞,无村眺望赊”,一草一木、一亭一槛都精心布置,把郊外之地变成文人向往的精神居所;在船上,他陈设书卷、琴剑、盆花,将漂泊生活打理得雅致有序,即便旅途因顿,也不失文人风度。

他重亲情、有担当。与妻子杨氏相濡以沫,不离不弃,在漂泊中始终守护家人;上船前储备医药,周全安排生活,不让家人再经历同谷绝粮的饥寒;疼爱子女,即便奔波辗转,也尽力为他们提供安稳的成长环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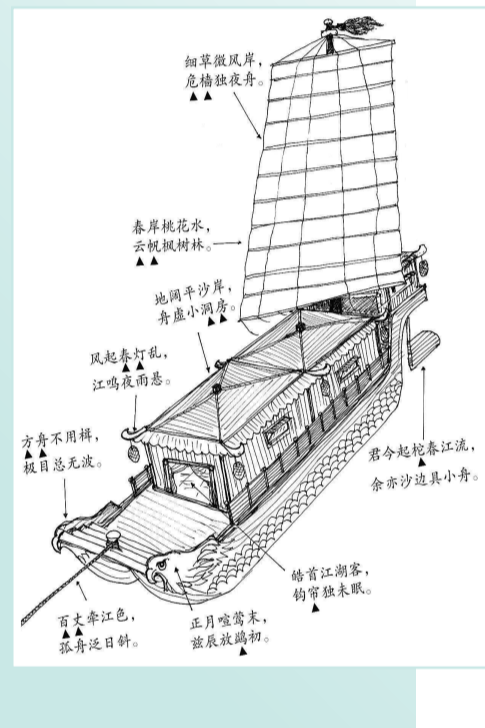
杜甫晚年确有疾病,肺病、消渴、风湿缠身,身体衰弱是真,但病弱不等于穷困潦倒,衰老不等于孤苦无依。他的困顿,多是战乱带来的动荡不安,而非衣食无着;他的清瘦,是疾病与衰老所致,而非缺衣少食。我们总以为杜甫是孤独的、凄凉的,却不知他的船上,有妻儿相伴、友朋相惜、舟工相助;他的晚年,有病痛、有忧愁,更有人间温情与生活尊严。这样的杜甫,比符号化的“苦情诗人”更亲切、更可爱。

◆ 伟大从不是苦难的勋章

杜甫之所以被尊为“诗圣”,不是因为



《杜甫的船: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,刘鲁颂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出版。



穷、他苦、他惨,而是因为他在苦难之上,始终坚守儒者的悲悯与担当。这本书没有消解杜甫的苦难,而是将苦难放回真实人生,让“诗圣”二字更有分量。他一生历经安史之乱,看过生灵涂炭,亲历流离失所,却从未被黑暗磨灭仁心,从

流失海外的国宝 从未忘记故乡

王晨辉

“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。”八百多年前,辛弃疾登楼远眺,故都难归,山河破碎,一句长叹郁结千古。八百多年后,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霍宏伟,将这声长叹化作书名——《望长安: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》。长安,早已不只是一座城,它是汉唐气象的象征,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。而“望”,是遥望,是守望,是盼望,是万里之外对故土的深情回眸,是流离百年对根脉的执着追寻。

当一件文物离开故土,它带走的不只是器物本身,更是一段历史、一方水土、一种文明的呼吸。

全球化的今天,我们早已习惯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看见中国文物:大英博物馆的唐三彩、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、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金村文物、日本泉屋博古馆的汉唐铜镜……它们被精心陈列,接受全球游客的赞叹,却很少有人追问:这些国宝如何离开故土?它们原本属于怎样的历史场景?它们身上,藏着怎样被遗忘的中国故事?这本书用扎实的考古实证、细腻的文献梳理,有温度的人文叙事,让每一件漂泊的文物,重新接上断裂的历史根脉。

全书聚焦八组代表性流失文物:洛阳金村战国文物、汉代人像砖柱、北魏至辽金佛教造像、昭陵六骏之“飒露紫”“拳毛騧”、唐代刘庭训墓三彩俑、唐代骑马女俑、战国汉唐铜镜、北宋银镜。时间跨度自战国至北宋,地域覆盖英、美、加、日等多国顶级博物馆,文物类型涵盖青铜器、玉器、造像、三彩、银器、石刻,几乎勾勒出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核心脉络。作者霍宏伟长期从事汉唐考古研究,亲历圆明园旧藏青铜器“虎鎣”归国工作,数十年深耕海外馆藏中国文物研究,足迹踏遍大英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泉屋博古馆等机构,以一手观察、一手文献,完成了这场跨越万里的“文物寻根”。

近代中国,内忧外患、战乱频仍,文物保护形同虚设,盗掘、盗窃、盗运成风,无数国宝在黑暗中流失,成为文明难以愈合的伤口。《怀履光去过金村吗?》一文中,对洛阳金村战国大墓文物流失展开追溯。金村位于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北端,1927至1931年,八座东周王侯大墓遭疯狂盗掘,金银铜器、玉器、漆器等数千件珍宝流失海外,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成为最大收藏者,而这一切,与传教士怀履光密切相关。

作者以严谨的实证,还原了金村文物“发现—盗掘—买卖—收藏”的完整链条:盗掘由当地恶霸组织,村民沦为苦力,出土文物被低价转卖;怀履光以圣公会河南主教、安大略博物馆文物代理人的身份,通过古董商蒯仕庵及金村本地代理人,大量收购金村珍宝,1929至1931年,仅标注“金村出土”的人藏文物就达97件。更令人唏嘘的是,金村大墓盗掘并非秘密,而是公开进行。盗墓者白日动工、摊贩林立,古玩商人络绎不绝,耕地被践踏,田禾被损毁,洛阳古物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。这些文物离开故土时,没有完整出土记录,没有科学考古信息,如同被拔掉根的草木,在异国他乡失去了原生语境,给学术研究造成永久遗憾。

作者没有停留在情绪控诉,而是用细节还原历史的残酷:金村文物盗掘者并非外来侵略者,而是本土乡民与恶霸,他们为生计所迫、为利益驱动,亲手掘开先祖墓葬。而怀履光等外籍人士,以“收藏”“研究”之名,行掠夺之实,明知中国法律禁止文物出境,仍利用特权偷运,将中华文明的瑰宝据为己有。这种“内盗外抢”的合力,造就了金村文物流失的悲剧,也成为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。

书中另一桩震撼人心的流失故事,是昭陵六骏的漂泊。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征战坐骑而下雕刻的石刻,由阎立本绘图、阎立德主持,欧阳询书丹,堪称初唐艺术巅峰,其中

“飒露紫”“拳毛騧”于1913年被盗运下山,1918年现身美国宾大博物馆,至今未能归国。作者在宾大博物馆亲眼目睹两骏,“昂首天外,西望长安”,那份欲归不能的怅然,正是千万流失国宝的共同心声。从陕西礼泉九峻山到美国费城,短短六年,两骏跨越重洋,却再也回不到故土,它们身上的裂痕,既是石刻的伤痕,也是文明的伤痕。

如果说流失史是本书的“痛”,那么考证史则是此书的“骨”。作者以考古学者的严谨,完成了一场“文物侦探”式的解谜,纠正海外学界百年错误,夺回中国文物研究的话语权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,便是《谁是刘庭训》对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唐三彩俑的身份考证。

13件唐代三彩俑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“明星展品”,被馆长霍吉淑比作“卢浮宫的蒙娜丽莎”。百余年来,海外学界一直认定其出土于“唐代刘庭训墓”,这一说法源自1921年英国学者霍布森的文章,依据是墓志拓本的英文音译,从未有实物佐证。霍宏伟在编纂《海外藏中国古物》时,发现这一疑点:检索洛阳出土墓志目录,始终查不到“刘庭训”,却找到卒年为开元十六年(728年)的刘庭训墓志,现藏开封市博物馆。

他逐一比对墓志文字与霍布森记载的官职、卒年、寿龄,最终证实:大英博物馆所谓“刘庭训”,是音译误写,正确墓主人为刘庭训——唐代忠武将军、正四品上阶,历任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四朝,参与平定契丹叛乱、诛杀张易之、剪除太平公主党羽等重大事件,一生跌宕起伏。作者不仅纠正了百年人名错误,更考证出刘庭训墓位于洛阳邙山上东里,推测墓葬被盗与1905至1908年汴洛铁路修建直接相关,完整还原了三彩俑的出土背景与墓主人传奇人生。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大英博物馆认可,成为中国学者在海外馆藏文物研究中夺回话语权的经典案例。



《望长安: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》,霍宏伟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类似的考证,贯穿全书。针对大英博物馆将北宋银镜定名为“银盒”,作者结合纹饰、形制、用途,考证其为北宋银镜,用于盛放铜镜,纹饰为唐代薛媛对镜自画像,这一结论被大英博物馆采纳,更新展品说明并搭配铜镜与宋代仕女图复制品展出;针对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唐代骑马女俑出土地争议,作者通过服饰、造型比对,确定其出自陕西关中,还原盛唐女性开放风尚;针对汉代人像砖柱,作者破解其“承托墙砖+镇墓辟邪”的双重功能,纠正海外对汉代建筑构件的误解。

近代以来,海外馆藏中国文物的研究话语权长期被西方学者掌握,他们因语言、文化、文献的隔阂,常常出现定名错误、年代误判、背景模糊等问题,导致中国文物被“误读”“矮化”。霍宏伟的研究,以中国学者的本土文献优势、考古专业积

未被现实压弯脊梁。

在夔州,他病体缠身,仍写下《白帝》:“戎马不如归马逸,千家今有百家存。哀哀寡妇求求尽,恸哭秋原何处村?”为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痛哭;登岳阳楼,他老病孤舟,仍吟出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,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”,心念家国安危,将个人悲喜与天下兴衰紧密相连;在湖湘大地,他目睹百姓因沉重赋税卖儿鬻女,愤然写下《岁晏行》:“况闻处处鬻男女,割慈忍爱还租庸……万国城头吹画角,此曲哀怨何时终?”为底层百姓发声,追问时代苦难的尽头。

诗人李少君评价此书:“即使沉落于时代命运的困境,杜甫的诗歌创造力和总能如长江奔涌,不断迸发,其精神意志和生命力,似沿长江而下的船,总是能冲破一切险阻阻隔。”

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,他明明可以安于船上的安稳,却偏偏放不下天下寒士;他明明拥有体面生活,却始终为战乱苍生忧思;他自己饱经忧患,却永远先为别人流泪。

◆ 守住自己的人生之船

《杜甫的船: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不只是一本杜甫研究著作,更是写给当下每一个人的入生之书。

我们身处的时代,同样充满不确定。焦虑、漂泊、压力、迷茫,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。有人在困境中失去体面,有人在喧嚣中迷失初心,有人在风浪中放弃坚守。而杜甫用最后五年的江上行舟,告诉我们何为真正的强大与高贵。真正的强大,不是永不遭遇风浪,而是风浪再大,也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船——有安身立命的底气,有坚守本心的定力;真正的高贵,不是一生顺遂,而是身处沉浮,依然心怀悲悯,不忘他人疾苦;真正的诗意,不是远离人间烟火,而是在日常里坚守温度,在困顿中保持善良。

杜甫的船,行过长江三峡,行过洞庭烟波,行过千年时光,一直行到今天。船上那位老人,不再是瘦弱愁苦的符号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可感可亲的人。我们不必再把杜甫塑造成苦行僧,不必再用“穷、瘦、苦、惨”来抬高他的精神。他可以有病痛、有忧愁、有失意,也可以有体面、有收入、有情趣、有选择。正是这些真实、复杂、有温度的侧面,才让他从课本画像,变成活生生的人。

那不是一艘破船,不是一处绝境,而是他生活了五年的家园,是他安放诗心与灵魂的归宿。千百年江水流淌,带走了岁月沧桑,却带不走他的诗歌与精神。该书以一艘船重构一段人生,以一段人生校正千年偏见。它让我们看见:孤舟非破船,诗圣非穷儒;苦难是际遇,不是标签;伟大是坚守,不是表演。

杜甫的诗里不是只有苦难,更装着世间最温柔的美好。他写风雨如晦,也写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;写战乱流离,也写“泥融飞燕子,沙暖睡鸳鸯”;写人间疾苦,也写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的牵挂与温暖。就像他那条漂泊江上的船,一面承载着乱世的颠簸与风霜,一面收纳着江风、月色、峰峦、橘柚,装着家人的笑语、书卷的清香、对故土的执念与对太平的向往。苦难是他的底色,却不是他的全部;漂泊是他的命运,却不曾淹没他心中的光亮。他把眼泪留给苍生,把温柔留给生活,把坚韧刻进灵魂。

或许,我们从此可以放下刻板印象,遇见那个不贫、不弱、不孤、不屈的真实杜甫。更愿我们在自己的人生江上,造一艘属于自己的船。稳得住身心,守得住初心,行得到远方,在不确定的时代,活出确定的自己。

淀,重新定义文物,还原历史,证明:只有中国人,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文物;只有立足本土历史语境,才能揭开海外馆藏文物的真实密码。

书中对刘庭训人生的还原,很有意思。这位唐代武将,从从九品下阶的左卫上长,一步步升至正四品上阶的忠武将军,一生历经四朝、三次参与核心军事行动:平定契丹时,他是大总管李多祚的谋主,智计百出;神龙政变中,他亲当矢石,诛杀张易之,辅佐中宗复位;先天事变中,他身为太平公主府典军,却暗中效忠玄宗,提前通风报信,助力平定叛乱。他不是史书留名的大人物,却是盛唐政治变局的亲历者,他的人生,折射出盛唐武将的忠勇与智慧。

盛唐气象,在文物中处处可见。大英博物馆的三彩文官俑,头戴进贤冠,身着宽袖袍,赭色褐、绿、白相间,高逾一米,气度从容;天王俑瞋目拧眉,身披铠甲,足踏卧羊,气势威严;骆驼俑昂首嘶鸣,驮载丝卷、胡瓶,尽显丝路繁华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骑马女俑,梳丫髻,着男装,身姿矫健,打破传统女性着装的封闭性,完美诠释盛唐“兼容并蓄、开放包容”的时代风尚。这些文物,是盛唐国力的缩影,是中华文明自信从容的见证,即便流落海外,依旧散发着震撼人心的文明光芒。

书中对佛教造像、铜镜、银镜的解读,同样直击文明内核。宾大博物馆藏北魏至辽金佛教造像,佛、菩萨、天王造型庄严,线条流畅,承载着古人的虔诚信仰;日本泉屋博古馆的汉唐铜镜,战国动物纹到东汉画像镜,唐代人物镜,方寸之间纳大千世界,记录时代审美变迁;北宋银镜纹饰,纹饰细腻、工艺精湛,藏着宋人温婉精致的生活情趣,让我们看见,中华文明不只在金戈铁马的盛世,更在一器一物的日常之中。

作者的字里行间是一位文博学者对文明的敬畏、对故土的深情。“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,仿佛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粒粒珍珠,我挑选出其中一些,试图用一个主题作为丝线将它们串联起来,为读者朋友们展示一条美丽的项链。”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”文明的脚步,从未因流失而停止;故土的召唤,始终在万里之外回响。那些漂泊海外的国宝,从未忘记长安,从未离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。而我们,更应记住它们的故事,守护好现存的文化遗产,让每一件流失的国宝,早日回到中国。